

康德哲学革命的意义

——兼论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

雷 红 霞

怎样从康德哲学主流的先验唯心论和不可知论中,正确理解其哲学革命的意义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是本文探讨的主题。康德开创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重要位置,以人的本体论取代神的本体论。以先验唯心论形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不可知论形式发挥反神学的人本主义,体现了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所具有的特征。他既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理论来源,又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先驱,预示了它的演变趋向和某些特征。研究康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以其批判的先验的唯心主义在德国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体系,”^①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固然具有矛盾调和的性质,但其主流无疑是先验唯心论和不可知论。从这种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哲学中,如何正确理解康德哲学革命的意义,及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深远影响,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发掘康德哲学的真义,批判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产生的渊源、演变的趋向和主要的特征,具有启发性的作用。

诗人海涅曾把德国的哲学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相比较,视康德为思想领域里的罗伯斯比尔,并称:在“思想领域里这位伟大的破坏者伊曼努尔·康德在恐怖主义上远远超过了罗伯斯比尔。”^②罗伯斯比尔的大刀只能砍下人头,而康德哲学的大刀却能改变哲学思想领域里的一切,开创新的时代,它砍倒了传统哲学中的上帝、神灵,有力批判了上帝存在、灵魂不死的证明,将上帝从《纯粹理性批判》中驱除出去,使哲学真正摆脱神学的束缚,开始了自身的独立发展。从此,人的本体论取代了神的本体论,人学战胜了神学,人成为宇宙的中心,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一切都只有相对人而言才有意义和价值。

确立人在哲学中的重要位置——人的本体论取代神的本体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本体论大致经历了由自然本体论到神的本体论再到人的本体论,这一发展过程粗略地再现了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的轨迹。

西方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标志着它摆脱了宗教神话的束缚,开始清醒地面对令古人畏惧的自然,去探讨自然的本质。古希腊哲学家以水、气、火、四根、种子,原子等作为世界

万物的本原，正是自然本体论的体现^③。这种以自然为本的哲学，反映了希腊奴隶制的繁荣发展和古代哲人勇于探寻世界奥秘的科学精神。随着古代奴隶制的衰落，基督教的盛行，哲学渐与宗教合流，西方历史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经院哲学是神学恭顺的婢女，把对自然的认识转化为对上帝的认识，以论证上帝存在为神圣的使命，上帝创造一切，决定一切，改变一切，他全知、全能、全善。这种以神为本的哲学反映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一切的时代特征。文艺复兴预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科学的兴起，人性的解放，哲学逐步摆脱神学的束缚，恢复对自然界的清醒认识。同时近代哲学虽注重于研究作为主体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哲学的发展，但它仍未砍断神学的枷锁，获得自身固有的本性，笛卡儿论证了上帝存在，莱布尼兹说明了上帝万能，哲学的矛盾、难题被推入上帝的避难所中（如偶因论）。上帝这一巨大的绊脚石阻碍了哲学的发展，直至18世纪法国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才为从哲学中驱除神打下了基础。康德揭开了西方哲学史上崭新的一页，宣告了哲学与神学的断交^④，哲学与人学的联姻。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天上的神灵，而是地上的人，哲学是关于人类理性的终极目的的学科，为运用和发展人类理性服务。而人类理性所关心的一切事项总括在以下三个问题中：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⑤这三个问题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总问题：人是什么？这一斯芬克斯之谜正是康德渴求解决的哲学主题。针对这三个问题，康德相应地写下了三大批判（第三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较复杂，也可以看成是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中加以解决。），建构了批判哲学体系，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第一块较完整的真善美的思想丰碑，从此哲学挣脱了神学的锁链，不再从属于神，而从属于人服务于人，神的本体论为人的本体论所替代。这种人本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必然趋势。

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先验唯心论中的主体能动性思想和不可知论中的反神学人本主义思想

《纯粹理性批判》所需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即人怎样获得真理性的知识）？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对人类理性作一番批判考察，弄清人类认识的条件、范围和界限，以避免误用人类理性的独断论和放弃人类理性的怀疑论。对此，康德虽如黑格尔所批判的，把认识能力的考察同实际认识过程割裂开来，但却将前人忽视的主体能动性置于重要地位，因解决中心问题的根据或重要条件在人类理性本身，理智的先天思维形式范畴是“使一切普泛所谓经验所以可能的根据”^⑥（康德这里的经验即指知识）。唯有理智运用先天范畴将来自直观的感性材料加以规定、加以改造制作才能形成知识，知识是人这一主体能动活动的产物。为此康德自诩实现了认识领域中的哥白尼式变革，不是知识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知识，他说：我们不是作为一个等待赐教的学生，而是作为一个被授予一切权力的法官来探索自然的，……^⑦是我们人为自然界立法，为自然界颁布规律，“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⑧这里虽以唯心先验论否定了唯物反映论，但却高扬了人的理性，人取代了神，成为自然界的立法者和最高权威，难怪康德称之为“纯粹理性的新生论。”这种理性的新生、理性的能动作用，是以先验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康德借助先验论，不仅保证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且发挥了认识的主观能动性，而先验论又必然导致不可知论，二者紧密相连。因物自体刺激感官所产生的感性材料，经先天直观形式时间空间的整理安排，已打上了主体的印记，不是物自体了。再加上知性的先天思维形式

范畴，对感性材料又加以规定和改造制作所形成的，就更不是物自体的知识了。随着认识的深化，以先验论形式所发挥的主体能动性，使物自体离人心愈来愈远，愈来愈不可知，只有与认识主体相关的“现象”才是可知的，它属于此岸的、经验的、必然的世界，物自体则属于彼岸的、超验的、自由的世界，绝对不可知。划分两个世界和物自体不可知是康德先验唯心论哲学的必然结局。

康德不可知论的要旨在于论证：尽管科学知识的领域在无限扩展，但不论进步到何种程度，对于上帝、灵魂、自由则得不到丝毫的知识。他深刻揭露了莱布尼兹—沃尔弗形而上学对于上帝存在、灵魂不死证明的荒谬性，说明一切关于上帝、灵魂的理论论证都不过是毫无根据、自欺欺人的假知识和伪科学，彻底否定了自安瑟伦以来用理性论证信仰的作法，划清了理论哲学与道德信仰之间的界限，将上帝神灵从理论哲学中驱赶了出去。至此，哲学才第一次真正摆脱了神学的束缚^⑧，获得了自身固有的本性，能够在纯粹的哲学地基上探讨各种难题。神灵的驱除，不是限制了知识，而是扩大了知识的领域，为哲学自身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有力推动了哲学认识的大步发展。同时，神灵的驱除，使曾跪倒在神灵脚下的人站了起来，并取代神成为哲学的主人。哲学只能服务于人，体现人的价值与尊严，哲学家就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⑨康德全部哲学可以说是论述理性的人为真善美三大领域立法、颁布规律，阐发人的伟大创造力，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正如贝克所指出的：“康德引起了哲学人本学中的一场普罗米修斯式的革命。……人不是神。但是，借助于他的创造能力，他是神的一个缩影。”^⑩人不仅是神，而且高于神，康德在追求善的实践领域中，虽然还承认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但这都不过是达到“至善”——保证具有道德的人获得幸福的三个必要的假设，是使实践理性能自圆其说的工具，是从属于人，服务于人的，唯有人才是目的本身，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目的是创造者——这就是康德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康德的先验唯心论哲学中包含着一定的辩证法思想因素，即被前人所忽视的主体能动性思想（先天的时空、范畴的能动运用），不可知论中则包含着强烈的反封建神学的思想，充满了人本主义哲学的色彩（神从可知的现象界中被驱除出去了），而反宗教思想客观上又是有利于唯物论和无神论的，这种反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因素、反神学的人本主义，正是康德哲学中具有重大价值的思想内容，其哲学革命的真义正源于此。诚然，作为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康德，其哲学的积极内容，只能在先验唯心论和不可知论的形式下曲折地表现，反封建专制求个性解放的愿望只能迂回地表达，但这正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⑪所具有的特征。

康德哲学中的唯心辩证法因素，在他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发扬光大，从费希特、谢林直到黑格尔将其系统化，而反神学的人本主义则被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再度得到发展。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康德哲学的积极因素得到逐步阐发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⑫这一逻辑发展中的哲学精华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加以批判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康德哲学革命的真谛正在于此。此外，作为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人物的康德，不仅总结了前人哲学，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以至启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而且给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以重大影响，改变了哲学研究的方向，真正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重要位置。

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来源——隐含和预示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演变趋向和某些特征

苏联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尔曾形象地指出：“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④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康德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派别，无一不是从康德这座“桥”上走过来的，都渊源于康德，且不同程度地对康德哲学作出反应。

康德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时代，以人的本体论取代了神的本体论，人是目的是宇宙的中心，是哲学研究的主题。自然的一切不管安排得如何巧妙合理，如何符合目的，但如离开人类就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单纯的荒野，徒然的，没有最后目的。”^⑤人才是自然创造的最终目的，一切都只有相对于人而言才有意义和价值。这一人本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使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象的范围缩小了，研究方法改变了，把传统哲学研究的一些内容丢掉了。以致哲学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人的问题展开的，与人紧密相连。现代西方的两大哲学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都反对传统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的研究，反对传统哲学研究的抽象玄妙和空洞无用，主张哲学研究的具体明确和现实有用。特别是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带来了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从而大树了科学的权威。科学主义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消除社会的弊病，带来人类的幸福，因此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科学。而人本主义则相反，认为科学并非万能，只有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探讨有关人的自由、价值、选择、责任、人的解放等问题，才能达到人类的真正幸福。可见，两大哲学思潮研究的对象范围虽不同，但却殊途同归，都从属于人，服务于人，围绕着人这一最终目的展开，离开了人的哲学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本来，人世间一切现象无不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人类的一切思想就其实质来说，不过是对人自身、人的生活及人类社会制度的思考，谁也无法找到完全与人无关且有意义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人的问题理应是一切学科的重要问题，当然也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首先真正自觉地意识到这点，把人置于中心地位的是康德（休谟虽认识到：“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关”，但他并未意识到人是自然创造的最终目的，是最高存在），他开了哲学研究人的先河，使哲学研究由外部世界、神灵转向了人自身（真正实现了古代苏格拉底的哲学使命：“认识自己”），改变了哲学研究的方向，强调了哲学研究人的真实意义（诚然，康德的人本主义具有反封建神学的进步性，但仍是资产阶级抽象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人性论）。现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正是从不同角度继承了康德人本主义和意义思想，并作出各自的反应。即使科学主义以科学为本，主张哲学科学化，重视科学方法，但其实质是将科学方法绝对化，要求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和社会问题，相信科学可以使人性完善，社会进步，不断地造福于人类。（因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区别不仅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还在于二者研究人和社会的方法不同。前者坚持用科学和理性的方法，后者则反对之）因此，人才是真正目的本身，其他一切包括科学在内都是服务于人的，离开了人将毫无意义可言。世界及事物的意义是人赋予的，世间一切只有凭借人的意识才能获得自身的历史和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一部天体演化史、动植物发展史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是人给编写的，而它们自己则漠然无知。波普说，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把我们的目的加于历史，历史无意义，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说历史在进步，这是不可能的，历史的进步全靠我们。

⑩在此，康德的人本主义不仅预示了现代西方意义哲学的诞生，为它提供了某种思想原则，而且得到发展和深化。

康德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敏锐地观察到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单凭科学方法并不能解决人的问题。科学只能达于现象，本体则不可知。他关于现象界和本体界的二元划分（即《纯粹理性批判》的逻辑结论），隐含和预示了现代西方哲学演变的两种趋向（即两大哲学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夸大理性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方面，承袭了康德的思想，认为科学知识只能达于现象，不能达于本质，都把科学与人，事实与价值，真的问题与善、美的问题，科学知识与伦理、美学问题对立起来。正是这一二元对立使他们各执一端，处于不同的领域，导致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科学主义站在康德哲学的现象界中，致力于研究科学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如研究自然科学的逻辑和基础，科学知识的语言表达，科学知识的确实性和精确性，科学理论的结构、评价和验证，科学知识的生长规律，科学发展的模式等。简言之，这些研究将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大大地扩展和深化了，而人的问题，道德伦理、价值等问题则往往被他们所忽视。与此相反，人本主义则站在康德哲学的本体界中，致力于研究人的一系列问题，如研究人的自由、价值、选择、责任、人的解放等，使康德着力解决的人的自由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实践理性批判》研究的主题）得到扩展和深化。当然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康德的人本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则以非理性主义否定、取代了康德的理性主义（应该说，康德把人的意志情感领域归属科学无法认识的本体界，就已经开了把人的意志情感作为本体的现代人本主义先河，隐含某种非理性主义的因素，唯意志主义正源于此）。因此，人本主义对科学和理性常抱有敌对的态度，有关科学的问题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由上不难看出，现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都不同程度地渊源于康德，都各自以康德哲学的不同领域：真、善为出发点，对康德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研究的内容早已超出了康德哲学的范围，拓展了哲学研究的领域。同时，现代西方哲学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已将两大思潮分化后各自的弊端暴露出来，于是目前出现了两股思潮合流的趋势。其实这一趋向在康德那里早有显示，关于美的领域的《判断力批判》正是前两批判真与善的统一。本来，认识与道德、科学与人、必然与自由原就是辩证的统一，现代西方哲学将其分割开来，不仅有认识根源，更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矛盾与危机）。

康德以不可知论对形而上学的冲击，深刻影响了现代西方大多数哲学流派，预示了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现代厄运。尽管康德在主观上要求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但客观上他的批判哲学本身，却使形而上学丧命。他关于上帝、灵魂、自由的不可知论，宣告了形而上学的破产。其后黑格尔虽重建了思辨形而上学的大厦，但也无法挽救其衰落的命运。现代西方的大多数著名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基尔凯郭尔、罗素、摩尔、詹姆士、杜威等，都是在批评黑格尔哲学中创立自己哲学的。他们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反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反对研究抽象、超验、空洞无用的本体。既然康德哲学证明本体不可知，有限的认识主体就不奢望去认识。科学主义多数流派，从不可证明、不可检验的角度来反对思辨形而上学。如逻辑实证主义以意义标准来区分科学和形而上学，凡是既不能通过逻辑分析来证明，又不能用经验事实来证实、证伪或检验的句子，都是无意义的思辨形而上学，应加以拒斥。人本主义多数流派从缺乏可把握性、可体验性来反对思辨形而上学，他们反对传统哲学以抽象的精神、物质实体、自然为本体，主张以可直接把握亲身体验的人，即人的非理性心理意识为本体。其实他们不过是用新的思辨形而上学取代旧的思辨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等流派从缺乏有

用性的角度来反对思辨形而上学，认为传统哲学争议的问题，空洞而无实际用途，也就毫无意义可言。这样现代西方哲学不同于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从而深化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为它提供了更具体的论证。因为这抽象超验的本体无法证明，不可体验，缺乏效用，所以要加以抛弃。

康德哲学革命的真义，与其说是提供了某种真理，不如说是指明了哲学研究的意义和方向。他的哲学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发展的顶峰和总结，既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理论来源，又隐含预示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演变趋向和某些特征，成为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过渡的重要环节，给现代西方哲学以深远的影响。他关于人是什么的哲学主题，可说是揭开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序幕，标志着现代哲学抛弃了传统思辨的形而上学研究，由外部世界转向了人自身以及能造福于人的科学等问题的研究，预示了现代哲学研究的方向，指明了哲学研究的真实意义在于作为最终目的的人。康德提供了许多见之于当代哲学流派中的极有意义的论题，如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人的自由如何可能等论题，仍是现代许多哲学流派研究的主题，具有恒久价值和启迪作用。无疑，康德哲学构成了一种符合现代倾向的哲学理论，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正因为康德是现代哲学的祖师爷，在他的哲学中就不难发现现代哲学的某些特征。作为康德哲学主流的先验唯心论和不可知论，也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现代西方多数流派大都以反对形而上学标榜自己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实际上他们是以不同形式，或以主观经验(科学主义)，或以人的非理性意志、意识、心理情绪(人本主义)出发来说明世界，最终仍陷入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他们和康德一样，大都反对唯物的反映论。科学主义往往继承了康德的现象主义和不可知论，否认人们能达到具有客观实在意义的认识。人本主义则认为依靠理智的认识形式和方法，只能达到现象，只有通过神秘的直觉才能达到实在，从而都以不同方式陷入了先验论和不可知论。因此，康德哲学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其中辩证法思想因素、反神学的人本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继承，而先验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则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所继承。毋庸置疑，研究康德哲学，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以及深刻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8、100—101、588页。

④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01—102页。

⑤ 此处的自然本体论主要指古希腊朴素的唯物论哲学。正如恩格斯所说：“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36页）而柏拉图等唯心论哲学当不属于自然本体论，而应看成由自发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向唯心主义神学—神的本体论过渡的重要环节。

⑥ 此处哲学指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理论哲学。

⑦⑧⑨ 《纯粹理性批判》蓝译本1957年版，第549、119、11、569页。

⑩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3页。

⑪ 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虽是无神论哲学，但他们并未致力于将信仰神学从理论哲学中驱赶出去的工作，因此也就不存在使哲学摆脱神学的问题。当然，他们的无神论为康德划分理论哲学与道德信仰打下了基础。

⑫ 贝克：《我们从康德那里学到些什么？》，《哲学译丛》，1982年，第4期。

⑬ 戈洛索夫克尔：《陀恩妥耶夫斯基和康德》，转引自古留加：《康德传》，第121—122页。

⑭ 《判断力批判》下卷韦译本，1964年版，第109页。

⑮ 《现代西方哲学十大思潮》，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